

【论 文】

20 世纪 20 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的利弊分析¹

刘显忠²

内容提要: 20 世纪 20 年代, 苏维埃政权为了赢得国内少数民族的支持, 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本土化”政策, 即民族化政策。“本土化”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 使各少数民族亲身感受到了苏维埃政权对他们的尊重, 也增强了他们对当局的信任, 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位。但“本土化”政策也导致了地方民族主义及对民族地区非本土民族(包括俄罗斯人)利益的损害或忽视等问题。

关键词: 苏联 民族政策 “本土化”

“本土化”政策, 是苏维埃政权在民族地区推行的以苏联的少数民族语言取代俄语的政策, 也是把俄罗斯族人从新成立的民族共和国中迁出的政策, 目的是纠正旧俄国推行的强制俄罗斯化政策, 以增强少数民族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 通过吸收当地居民参与地方管理的方式巩固民族边区的苏维埃政权。其基本思想是斯大林在 1923 年春天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斯大林提出:“为了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对其他民族的农民同样亲近的政权, 就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其他民族的农民所了解的政权, 它必须使用本族语言办事, 学校和政权机关必须由熟悉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本地人组成。只有这些共和国的政权机关用本族语言说话和工作的時候, 苏维埃政权(直到最近还是俄罗斯的政权)才不仅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政权, 而且能够成为各民族的政权, 成为过去被压迫民族的农民所亲近的政权。”³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明确规定:“各民族共和国和各民族区域的机关主要应由熟悉各该民族的语言、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的当地人组成。颁布特别法令, 在为当地非俄罗斯民族居民和少数民族服务的一切国家机关和一切机构内, 保证使用本民族语言; 颁布法律, 对一切侵犯民族权利, 特别是少数民族权利的人, 用最严厉的革命手段予以追究和惩治。”⁴可见, 俄共(布)十二大实际上正式宣布“本土化”为布尔什维克党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方针。

“本土化”政策的积极成果

俄共(布)十二大后, 俄共(布)开始贯彻落实“本土化”政策。布尔什维克党当时所推行的“本土化”政策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使党和国家的机关干部“本土化”。十月革命前, 沙皇政府通过向民族边区的管理机关和行政机关安插俄罗斯人的方式对民族地区进行管理, 推行强制俄罗斯化政策。布尔什维克党掌权后, 积极吸收当地民族居民参加党政机关的工作, 提高本土居民代表在各共和国机关中的比重。在 20 世纪 20 年代实行“本土化”之后, 少数民族成员在共产党员中间, 在各个共和国党政机关中的比重都在明显上升。1922-1927 年, 共产党员中俄罗斯族人的比重从 72% 降到了 65%。

¹ 本文刊载于《俄罗斯学刊》2013 年第 1 期, 第 79-83 页。

²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研究员。

³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 民族出版社, 1990 年, 第 231 页。

⁴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 人民出版社, 1964 年, 第 289 页。



¹在乌克兰，1920年底乌克兰族人约占乌克兰总人口的80%。1922年4月在乌克兰共产党（布）中乌克兰族人占23.3%，俄罗斯族人和犹太人的比重相应地为53.6%和13.6%。²当时乌克兰族人在乌克兰政府机关中的比重不超过35%。³从1922年到1932年，乌克兰族人和白俄罗斯族人在他们各自共和国党组织中的比重分别从24%和21%增至59%和60%。1932年在中亚各民族共和国，本民族成员也已经占了他们所在共和国党组织成员的一半以上。⁴1924年，乌克兰族人在乌克兰的中央和省级机关中占39.9%；在外高加索，当地民族代表在中央及省级机关中占54.3%，其中：格鲁吉亚人占29%以上，亚美尼亚人占22.5%，操突厥语的民族（阿塞拜疆的主要居民）占1.5%。在土库曼斯坦，共和国级别机关中土库曼族人占10%，在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级别机关中哈萨克族人占8.3%。1925年，在白俄罗斯的中央机关中有42.6%的工作人员是白俄罗斯族。在巴什基尔中央执行委员会巴什基尔族人占50.5%，在雅库特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中雅库特族人占16%。到1930年前夕，“本土”民族在各自共和国级的机关中所占比例如下：在白俄罗斯占59.4%，乌克兰36.2%，外高加索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29.94%，哈萨克斯坦12.7%，鞑靼斯坦33.8%，阿塞拜疆36.79%，亚美尼亚93.53%，格鲁吉亚74.6%。⁵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中亚实行了“本土化”，但由于当地民族中有文化的干部不足，致使当地民族的人在国家管理机关中仍处于少数，而俄罗斯族人在其中占多数的状况没有多大改变。

另一方面就是大量建立民族语学校、推广使用民族语言。在帝俄时期，沙皇政府推行强制俄罗斯化政策，境内很多少数民族在语言、文化、教育方面都受到诸多限制。就乌克兰族人来讲，1906年俄国教育部同意把乌克兰语作为辅助语言以“解释学生不理解的内容”，但1907年这一决定又被收回。1908年俄国政府拒绝了一些杜马代表提交的关于乌克兰族人的初等教育使用母语的法案。1911年政府会议还强调，由于小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的旧称）和白俄罗斯族人不能列为异族人，他们的教育“应当用俄语进行”。1914年2月俄国内务部还反对纪念著名的乌克兰诗人Т.Г. 舍甫琴柯诞辰100周年。对犹太人的文化限制更为严格，1908年8月俄国大臣会议严格规定了犹太人进入高等学校的百分比：在各个首府城市是3%，在犹太人定居区以外的其他城市是5%，在犹太人定居区是10%。⁶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不仅废除了沙俄时期对少数民族语言、文化发展的限制，而且还在各地普遍建立了民族语学校，推广、普及少数民族母语，使少数民族学生都享受到了母语教育，满足了其境内各少数民族多年来一直争取但始终没能实现的要求。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小学共使用68种语言进行教学。比如，巴什基尔的小学用巴什基尔语、俄语、鞑靼语、乌克兰语、楚瓦什语、马里语教学；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小学用鞑靼语、俄语、楚瓦什语、马里语、乌德穆尔特语、莫尔多瓦语、乌克兰语、德语教学；克里木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小学用俄语、鞑靼语、乌克兰语、德语、犹太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保加利亚语、爱沙尼亚语、捷克语、波兰语、意大利语教学；达吉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小学用阿瓦尔语、俄语、拉克语、列兹根语、奥塞梯语、切尔克斯语、达尔金语、亚美尼亚语、库梅克语、德语教学。当时不仅在民族共和国和民族州建立了民族语学校，而且在俄罗斯族人（聚居或为主要居民）的地区也有类似的学校。比如，在列宁格勒州就有用俄语、芬兰语、爱

¹ Каттелер.А.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275.

² Лановик Б.Д. Лазарович М.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Київ, 2006, с. 371.

³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http://revolution.allbest.ru/languages/00001301_0.html.

⁴ Каттелер.А.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275.

⁵ Хмара Н.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1920-е—1930-е годы).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3, с.134. 按：在乌克兰出版的教学参考资料中，1923—1927年间，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中乌克兰人的数量从35%上升到54%。见 Лановик Б.Д. Лазарович М.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Київ, 2006, с. 374.

⁶ Дякин В.С.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о внутренней политике царизма(начало XX).См.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6,№11-12, с.48.



沙尼亚语、波兰语、拉脱维亚语、犹太语、鞑靼语、乌克兰语、德语和涅涅茨语进行教学的各种小学；在莫斯科州有用俄语、乌克兰语、拉脱维亚语、鞑靼语、犹太语、德语、莫尔多瓦语、卡累利阿语、茨冈语进行教学的各种小学；在中央黑土州有用俄语、乌克兰语、德语、鞑靼语、犹太语进行教学的学校；在伊万诺沃州有用俄语、白俄罗斯语、鞑靼语进行教学的学校。¹ 当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甚至还允许突厥斯坦的地方当局开办教会学校。还把由父母付酬请专门教师在课余时间苏维埃学校的教室里传授教义作为一项临时措施。²到1927年，有90%的白俄罗斯族小学生、94%的吉尔吉斯族小学生和几乎96%的鞑靼族小学生都在各自的共和国使用母语教学的小学学习。当时也为那些没有自己共和国的民族建立了这样的学校。比如在乌克兰，有一半的犹太人都在犹太语学校受教育。³1923年苏联有411所波兰语学校，其中685名教师，16086名学生。1924年8月还提出建立白俄罗斯族天主教徒和乌克兰族天主教徒的波兰语学校问题。1925年9月17日政治局根据边界地区委员会的报告提出了“扩大民族学校网”问题。⁴

当时，除大量建民族语学校普及民族语言外，苏联政府还要求在公文处理、教育、报刊出版等领域使用民族语言。例如，在外高加索，1925年大部分中央机关都用当地语言处理公文；在白俄罗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公文都是用白俄罗斯语写成的；在乌克兰各个省和民族区的机关，公文都使用乌克兰语。1922年乌克兰只有20%的公文采用乌克兰语，1927年这一指标达到了70%。⁵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在乌克兰的工业区改用乌克兰语的进程进行得比较缓慢。但乌克兰语最终还是成了乌克兰的主要交流语言，在官方公文和教育、报刊出版等领域被广泛使用。1929年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80%的中小学、60%以上的中等技术学校及30%的高等专科院校用乌克兰语教学。乌克兰语的报刊和出版机构的数量在扩大：一半以上的书籍、报纸和杂志都开始用乌克兰语出版。到1930年前夕，乌克兰语学校和俄语学校的比例是10:1，2/3的中等技术学校和1/3的高校都用乌克兰语进行教学。⁶

这一时期，苏联政府还在为无文字的语言创造文字做了大量工作。到1930年代末，46个无文字的民族都有了自己的文字。

这些措施的目的不仅是要发展民族文化和语言，而且也是要在其基础上普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本土化”政策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各少数民族亲身感到了苏维埃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也增强了他们对当局的信任，巩固了苏维埃政权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位。对布尔什维克党这一时期的民族政策，就是一些西方学者及持不同政见者也给予了高度评价。如一位德国历史学家称二十年代为“黄金时代”。⁷乌克兰的持不同政见者伊凡·麦斯特连柯也指出：“这些年代里出现了所有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文化和国家建设的空前的繁荣以及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的民族复兴。民族共和国和州的中小学改用当地居民的本族语言教学。加盟共和国的高等院校也改用本地语言教学，虽然到三十年代初取消民族区域自治前并不是每所大学都如此。加盟共和国的所有报刊和图书出版社也都改用本地民族文字出版。人们认为，供俄罗斯居民阅读的俄文报刊和书籍可由莫斯科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其他中心供应。绝大多数剧院也改用本地语言演出。在两个斯拉夫共和国（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由于本地语言和俄语相近，俄罗斯居民特别是工人和小职员，把自己的子女大批送进民族学校，认为这样更有前途。在某些县城和省

¹ Бурмистрова Т.Ю. Зерна и плевелы: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84).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3, с.41-42.

² Бурмистрова Т.Ю. Зерна и плевелы: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в СССР (1917—1984).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3, с.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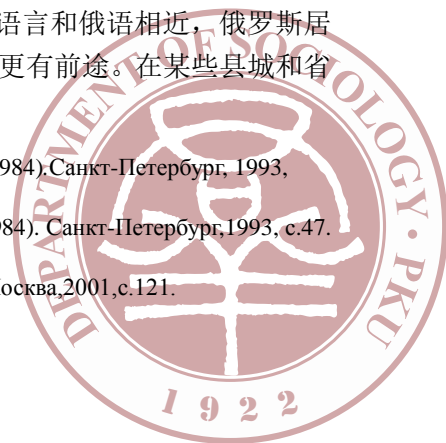
³ Капелер А.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276.

⁴ Костюшко И.И. Польск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меньшинство в СССР (1920-е годы). Москва, 2001, с.121.

⁵ Лановик Б.Д. Лазарович М.В. Історія України. Київ, 2006, с. 374.

⁶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http://revolution.allbest.ru/languages/00001301_0.html

⁷ Капелер А.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мперия. Москва, 2000, с.274.



城，人们在街上都讲起了本族语言，而革命前，本族语言被更‘文明的’俄语所排挤。总之，看来民族区域自治如能再继续十年，非俄罗斯共和国和州的民族问题就会完全解决而有利于当地居民。”¹

“本土化”政策的负面效应

在肯定“本土化”政策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的民族政策并没有一劳永逸地解决民族问题，相反在推行“本土化”政策的过程中，解决了革命前在民族关系中存在的问题，由此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本土化”政策的实施导致了非本土民族（包括俄罗斯人）利益的损害或忽视。奥尔忠尼启则在1923年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了各个共和国忽视非本土民族的事实。根据1923年的资料，当时在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中，没有一位人民委员是出身于俄罗斯民族或亚美尼亚民族，格鲁吉亚共产党的情况也是如此。在梯弗里斯（1936年改称第比利斯），第二届梯弗里斯苏维埃的成员中，格鲁吉亚族人占43%（尽管他们在格鲁吉亚首都居民总人口中仅占25%），亚美尼亚族人占17%（在梯弗里斯的总人口中占1/3以上）。²在一些民族地区俄罗斯族人成了新的“少数民族”，其利益也受到了损害。1923年8月一份提交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分析报告就指出：“在苏联的很多构成体中，俄罗斯族居民的利益都受到了损害，而原住居民获益。”³ 戈尔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俄罗斯族居民代表在一份呼吁书中说：“俄罗斯族居民的生活状况令人难以忍受，正在普遍走向破产，被迫搬出戈尔共和国……对俄罗斯族人经常不断的掠夺和采取的强制措施完全破坏了民族地区的经济。”⁴ 有些卡尔梅克的俄罗斯族人当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应当赋予我们与卡尔梅克人同样的权利。”⁵ 忽视俄罗斯族人利益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除俄罗斯联邦外其他加盟共和国都有自己的党组织。在1925年12月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俄共（布）改称联共（布）后，因党的名称的改变在党的高层出现了建立俄罗斯共产党问题的讨论。当时奥尔忠尼启则提出组建俄罗斯共产党的建议，加里宁表示支持，伏罗希洛夫也认为在按国家的名称更改党的名称的情况下，“从逻辑上讲必须组建俄罗斯共产党，因为在苏联中有俄罗斯联邦。”但斯大林反对这一要求，认为建立特殊的俄罗斯共产党是非常危险的，“有可能导致党以联邦制的形式分裂”。⁶

其次，“本土化”政策导致民族主义情绪的滋生，而民族主义情绪又导致了中央以地方民族主义为借口采取不正常的形式进行反民族倾向主义的斗争。如1928年初，在亚美尼亚揭露了所谓的“独特性主张者”集团，他们被指控过分强调各共和国的民族独特性。在乌兹别克斯坦，突厥斯坦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У. 霍贾耶夫（У. Ходжаев）、黑德拉里耶夫（Хыдыралиев）等被指控为“民族右倾主义”，他们被指控包庇巴依（中亚、新疆地区的富牧主、富地主）、原沙皇官员和那些推行民族主义路线及反对中央派来的干部的人。在哈萨克斯坦，1926年尖锐地批判了共和国的工作人员С. 萨德沃卡索夫（С. Садвокасов）、С. 哈贾诺夫（С. Хаджанов）、Ж. 蒙巴耶夫（Ж. Мунбаев）的“民族倾向主义”集团支持阿乌尔（高加索、中亚等地的乡村）的剥削分

¹ 伊凡·麦斯特连柯著、林钢译、船甲校：《苏共各个时期的民族政策》，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4页。

² Хмара Н.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 (1920-е—1930-е годы).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3, с.134.

³ Хмара Н.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 (1920-е—1930-е годы).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3, с.131.

⁴ Хмара Н.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 (1920-е—1930-е годы).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3, с.131—132.

⁵ 同上，第132页。

⁶ Вдовин А.И.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30-х годов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корнях кризиса меж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 в СССР). См. 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Серия. 8. история. 1992, №4, с. 26.



子，阻挠工业的发展，力图使哈萨克斯坦与其他共和国分开等。1926年共和国著名的活动家Т. 雷斯库洛夫(Т. Рыскулов)被控犯有民族主义性质的错误。鞑靼布尔什维克的杰出代表、民族人民委员部委员会成员М.-Х. 苏丹-加利耶夫(М.-Х. Султан-Галиев)于1923年被开除出党，而后在鞑靼对“苏丹-加利耶夫分子”进行了长时间的搜寻。1928年捏造了新的作为国际帝国主义和一系列外国总部的代理机构的“苏丹-加利耶夫集团”案(苏丹-加利耶夫本人在1940年被枪决)。当时对民族主义者进行的没有充分根据的镇压使各个民族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对这种结果，苏丹-加利耶夫实际上已经预料到了，他在一次会议上曾指出，大国沙文主义者“……将会以巴什基尔民族主义为借口，打击巴什基尔共产党人……同地方民族主义的斗争有可能采取不正常的形式”¹。

第三，“本土化”政策主要是要消除沙俄时期推行的违背少数民族意愿的强制俄罗斯化的影响，但在推行过程中有些地方同样表现出了不顾少数民族自身的发展特点，违反少数民族意愿的行政命令式的强制性特点。比如，在白俄罗斯，在苏维埃选举时，同俄罗斯交界地区的几个村的居民出于现实的考虑，做出了“在学校不实行白俄罗斯化”的决议，附在了给代表的委托书后面，但未被接受。1927年斯摩棱斯克州有些犹太村苏维埃主席反对把公文翻译成犹太语，认为这办不到。²在乌克兰，当时作出了在1926年1月1日前结束国家机关和企业的“乌克兰化”的决议，但乌克兰当时的领导人没有表现出特殊的热情，结果，1925年4月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埃曼努尔·克维林(Эммануил Квиринг)被免职，代之以拉·卡冈诺维奇(Л. Каганович)。卡冈诺维奇任命原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大·舒姆斯基(А. Шумский)为乌克兰教育人民委员，狂热地推行党和政府的决议，开始了全面乌克兰化进程。在敖德萨，乌克兰族学生不到1/3，但所有的学校也都“乌克兰化”。“乌克兰化”政策在当地的乌克兰民众中并没有得到支持。不仅在学校和其他学术机构，而且在机关和日常生活中乌克兰语都是以强制的革命方式和“斯达汉诺夫”的速度推行的。有几年在基辅曾禁止所有的俄语出版物出版，而一些不太懂乌克兰语的年老职员、甚至一些流利地掌握乌克兰语口语的乌克兰族人都被残酷无情地从各个机关中赶了出来。乌克兰“意识”成了担任各种职位的主要的、唯一的标准。当时各个机关和企业的职员，包括清洁工和管院子的人都要“乌克兰化”。不想“乌克兰化”或乌克兰语考试没通过的人被免职，无权领取失业补助金，并持有黑籍证(帝俄时代发给革命者的证件)。³

结 论

从苏联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民族政策上不能走极端，不能迷信行政力量，应该尊重人民自己的选择。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不能按民族成分来确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培养公民平等意识是十分重要的。苏联20年代推行的“本土化”政策意在纠正沙俄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但是矫枉过正，同样也带来了对国家许多不利影响。正如苏联解体后曾担任乌克兰总统的Л. 库奇马所总结的：“卡冈诺维奇不懂乌克兰语，但以突击性的方式学会了乌克兰语，这给全体工作人员树立了榜样。他大量吸收乌克兰人入党，把苏维埃工作人员中乌克兰人的比重提高了50%，很快，共和国大部分的书、杂志和报纸都用乌克兰语文出版。一些著名的文化和艺术学者、作家信任共产党人，从国外返回乌克兰。乌克兰语在一些指挥员学校和红军的一些部门里推行。截至1927年，乌克兰的大部分中等专业学校和四分之一以上的高等专科学校都改用乌克兰语教学，这只是开始。1930年，用乌克兰语教学的学校数目为85%。无论对1920年代发生的情况抱

¹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на перекрестке мнений. 20-е год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осква, 1992, с.200.

² Хмара Н.И. Из опыта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в СССР(1920-е—1930-е годы). См.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6, №3, с.135.

³ Политика украинизации. http://revolution.allbest.ru/languages/00001301_0.html.

何态度，应当承认，如果不是当时实行学校的乌克兰化，也许就不会有我们今天的独立。大众化的乌克兰学校，培养了千百万乌克兰人，正如时代所表明的，大众化的乌克兰学校成了乌克兰的乌克兰因素最重要和最无法破坏的要素。”¹ 苏联的解体表明，苏共的民族政策是不成功的，苏联并没有找到如何巩固和发展多民族国家、保障各民族和谐共处、共同繁荣之路，苏联的教训值得研究和总结。

【论 文】

20 世纪 20-30 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²的实践³

刘显忠⁴

内容提要：20 世纪 20-30 年代苏联“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表现为乌克兰化。“本土化”政策在乌克兰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贯彻落实的。强制乌克兰化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党员及苏维埃机关中本土民族的成分增加，乌克兰语得到了推广，促进了乌克兰民族教育的发展。但乌克兰的“本土化”是与当时苏联推行的新经济政策的命运密切相关的，随着新经济政策的终结，全国中央集权化的加强，民族关系领域的宽松政策也难以继，导致了对乌克兰化政策拥护者及乌克兰民族知识分子的打压和“清洗”，乌克兰化政策收缩，乌克兰重又回到了两种语言并存的状态。

关键词：苏联民族政策 本土化 乌克兰化

“本土化（Коренизация）”政策，是 1920 年代及 1930 年代初苏维埃政权处理苏联民族问题的政策。其目的是纠正旧俄国推行的强制俄罗斯化政策在少数民族中造成的不良影响，增强少数民族对苏维埃政权的信任，通过吸引当地居民参与地方管理的方式巩固民族边区的苏维埃政权。民族自决权理论和《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是“本土化”的意识形态基础。

1920 年 10 月 10 日，斯大林第一次正式宣布了苏维埃的“本土化”政策的基本思想：“必须使边疆地区的一切苏维埃机关，即法院、行政机关、经济机关、直接政权机关（以及党的机关）尽可能由熟悉当地居民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语言的当地人组成。”⁵在 1923 年春天举行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本土化”政策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当时在民族问题上的主要方针最后成型。斯大林在大会上强调各民族的友好关系，指出：“为了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对其他民族的农民同样亲近的政权，就必须使苏维埃政权成为其他民族的农民所了解的政权，它必须使用本族语言办事，学校和政权机关必须由熟悉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本地人组成。只有这些共和国的政权机关用本族语言说话和工作的時候，苏维埃政权（直到最近还是俄罗斯的政权）才不仅能够成为俄罗斯的政权，而且能够成为各民族的政权，成为过去被压迫民族的

¹ Кучма Л.Д. Украина—не Россия. Москва, 2003, с.19. Медведев Р. Расколота Украина. Москва.

² 乌克兰是个新国家，它作为一个统一独立的主权国家出现在世界版图上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本文所说的乌克兰，是 1939 年前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还不包括面积近 15 万平方公里的西乌克兰。

² 乌克兰是个新国家，它作为一个统一独立的主权国家出现在世界版图上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本文所说的乌克兰，是 1939 年前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当时还不包括面积近 15 万平方公里的西乌克兰。

³ 本文刊载于《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 年第 4 期。

⁴ 作者为历史学博士，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斯大林论民族问题》，民族出版社，1990 年，第 149—150 页。

